



昭昭如愿 岁岁安澜

——陇上春联习俗琐谈

□ 王君安



甘肃河西地区出土的桃符简牍。 资料图



舟曲元宵松棚楹联灯会。 资料图

称的《山海经》里描写得最为生动,说是“沧海之中,有度朔之山,上有大桃木,其屈蟠三千里”。桃树上有二位神人,一曰“神荼”,一曰“郁垒”,这二神专司驱邪一事,后来演变成我国民间信仰中最早的“门神”。秦汉以后,桃符已广为流行,当时的著作《左传》《战国策》《淮南子》《论衡》《风俗通义》等皆有描述,并不忘强调其祈福禳灾功用。难得的是,在甘肃河西,出土了不少汉代桃符。如在金塔一带出土的一块桃符,用木条削成箭头形,上面画着浓眉大眼的张嘴人面,这是民间对“神荼”“郁垒”形象的简化。这个桃符中间有一穿孔,则是春节时用来穿绳悬挂门楣,以此希冀驱邪赐福之用。而广为认可的“神荼”“郁垒”造型,是汉代画像砖上出现的一对魁梧勇士,衣带飘扬,不失威严,奠定了后来我们熟知的“门神”的将军造型。

每逢春节,先民们在桃木上刻画门神造型。后来,索性就直接写上“神荼”“郁垒”的名字;再后来,写了名字后顺带写两句祈福迎春的吉祥话,唐代以来,就有了题写迎春诗文的“桃符题辞”;再后来,迎合门框左右对称的特点,两边各写一句,两两对称粘贴,这时我们熟悉的春联才悄然出现。宋人《岁时广记》记载,“桃符……上画神像、猿猴、白泽之属,下书左郁垒、右神荼,或写春词,或书祝祷之语。岁旦则更之。”由此可见,到宋代桃符所写仍是“祝祷之语”的吉祥话。故而王安石《元日》里的桃符,确实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春联。

目前学术界普遍认可,有文献记载的最早春联,是见于《宋史》等文献的蜀后主孟昶所题“新年纳余庆,嘉节号长春”一联,此时,已步入五代。从桃符画像到春联题句,这个脉络看似简单,实则流传了一千多年。在我国春联习俗演变的历程中,甘肃的河西走廊在中国楹联史上留下重要一笔。在敦煌藏经洞里,标注为“斯坦因0610V”的写经卷上,发现了“岁日:三阳始布,四序初开。福庆初新,寿禄延长。又:三阳回始,四序来祥。福延新日,庆寿无疆。立春日:铜浑初庆轨,玉律始调阳……”的对仗文字,以及“书门左右”的显著字眼,不少学者由此断定这不仅是中国现存最早的春联,也为“楹联产生于唐代”之说提供了有力佐证。倘若这份可能题写于唐开元年间的文字果真是楹联,那中国楹联史必然要改写。但学术的考证需要严谨,经过认真阅读原件,发现这些原本连在一起的句子,被按照现代“对联”的样子有意排成了两句一段。而且根据句尾押韵的特征,基本可以断定,这张经卷上的内容准确

地说是两段诗文,这仍是“桃符题辞”的一种。可这并不遗憾,因为我们从中看到了春联的“模子”。在那个楹联尚未产生的年代,人们已经习惯将对仗整齐的吉祥句子在春节时贴于门旁。敦煌这张珍贵写经虽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春联,无疑是重要的楹联成形史料,也可以说是目前现存最早的春联雏形。

步入元明,我们所熟知的春联已基本成形,明代《百家巧联》《唐诗春联新谱》等日用之书已可见各类春联。很多人可能没想到,现在仍家喻户晓的一些春联,如“天增岁月人增寿,春满乾坤福满门”“生意兴隆通四海,财源茂盛达三江”等,竟然是从明代流传下来的。也是在明代,文人群体开始普遍参与楹联创作,而甘肃目前可见文献中,最早有联稿传世的,已经到明末清初的陇西籍名士,也是书法大家的王了望。其自撰春联“玉历颁新,春在梅花枝上出;桃符换旧,瑞从柏叶酒中生。”正是新桃换旧符,一派祥和的新春气息。与王了望几乎同时期,西北边陲有着“藏乡江南”之誉的舟曲,每到春节,各族群众便采摘松枝搭建灯棚,将传统春联与元宵灯艺巧妙结合,在松棚下动辄挂起数百对用红对联裱糊的灯柱,如清代舟曲文人张尚仁所写灯联“头顶灯,手提灯,灯连万户成灯市;你望月,我看月,月照千家是月宫”,一时柏翠灯红,联墨交辉,而这道独特的人文景观,至今已坚持举办四百余年,堪称我国春联文化的“活化石”。

清代以后,陇原各地春联习俗已蔚然成风。清康熙《岷州志》记载,“除夕,贴彩胜、春联于门,具椒盘、柏酒为团圆之庆”,清乾隆民勤《镇番县志》也写道:“除夕,扫除庭院,挂黄钱,贴门神、门对等物,以迎春禧,间用桃符。”可见

从陇中到河西,古之桃符、春胜等习俗兼而有之,而贴春联已成为春节时一项主要的文化习俗。如清人叶礼《甘肃竹枝词》中所写:“元旦纷纷庆贺人,题名门上对联新。”这一时期,甘肃也诞生了一批流芳后世的联家,春联自然成为他们笔下不可或缺的题材。如清中期漳县文士成大猷所书“春回柳眼梅须里,家在山光水影中”,目光所及,俱是春明景和之象。清光绪二十五年,三十五岁已主讲兰州五泉书院的晚清翰林刘尔圻踌躇满志,那年春节他自撰了四副春联,其中一副是“须持此志向坚牢,饮食起居,无非是学;能洗得心头干净,虫鱼花鸟,触处皆春。”乃是阐述个人抱负。

俗话说“年年岁岁春相似”,但岁岁年年家事、心境却有不同。清雍正陇西进士陈长复曾自题春联:“燕子衔春,问主人今年可好;梅花睡雪,占魁信此处独先。”上联以燕子的拟人写法抛出一问,“今年可好?”也好像在和主人商量,休说去年烦心事,借此春风道:“今年也可以好。”近代河州学者邓隆则较为知足,他写下春联“椿树长春,桂兰有福;鸿钧转运,龙凤呈祥”,古人以椿树代指父亲,他在春联中委婉地表达老父健在,自己能侍奉左右,岂不自有“福”来。而1914年陇西名士蔡建邦所撰春联“女将红纸剪窗花,花开富贵;儿负湿薪同爆竹,竹报呈祥”,便是儿女承欢膝下的另一种知足常乐。相传百年前,秦州某人写下这样一副春联:“居三尺室迎宾朋,站也由我,坐也由我;买二斤肉包饺子,饭亦是他,菜亦是他。”身居陋室,却能安然自得,这样的春联倒也豁达。抗战时期,家运与国运紧密相连。在兰州街头,出现了“有钱出钱,有力出力;闻败勿馁,闻胜勿骄”的春联。寓居兰州的张质生老人也在

1942年写了一副春联:“白首喜偕兄,元日晋一樽春酒;青年宜报国,岁星祝四海安澜。”这是他听闻陇上青年奋勇报名参战后的激动之情。

近代华亭学者幸邦隆在其《楹联丛稿》小序中说:“楹联为表示文明精神之一种……用之未尝少衰。”的确,青春不复,时光易逝。恰好书春之时正值岁月交替,往往此时,最容易引发对人生的感触,所以或是慨叹,或是希冀,好的作者,总能在贴春联的时候,将自己心中的感慨也一贴无余。而为了更好地表达辞旧迎新之意,人们过年时,不仅大门、院门或是房门贴满春联,就连厢房、厨房、后门,乃至磨坊、井房、鸡圈,只要能贴的地方都贴满春联,也许满屋子都“挂红了”才算是过年的底色。近代武都名士刘元凯,将自撰春联“射虎期穿石,闻鸡愿著鞭”,当作座右铭书挂中堂。陇上文史大家张维的春联:“我先人以勤俭起家,出处须思清白训;问同学今轮盖安在,男儿许读圣贤书。”更像是传之子侄的家训,发人深省。而在兰州青城古民居里,写在粮房的春联“惜米如惜玉;存粮似存金”,写在羊圈的春联“出郊不失成群意;跪乳能知报母情”,都是以精巧构思,流露着生活情趣。

在兰州、白银等地,除了大门贴上大福字,人们还在春联上下联最上方贴两个小福字,有“联头贴福”的习俗,寓意“福上加福”;在河西一些地方,贴完春联一定要同时放一串鞭炮,这是随春书写的好兆头,是新的一年郑重开始的仪式感。而即便家中正值丧哀,人们也不忘通过春联表达慎终追远之意,陇中地区至少清初就流传有“守制春联”的习俗,在守丧初年不挂春联或悬挂黄纸、蓝纸书写的春联,第二年换成蓝绿紫等彩纸春联,到第三年传统意义上的守制结束,又换成红纸春联,在写上“慎终须尽三年礼,追远常怀一片心”的同时,春联颜色的三年渐变,其实也是家人心情逐渐恢复平和,坦然面向未来的过程,这一古老习俗,也是一场心灵修复的实践活动。

关于春节,民间有一首广为流传的民谣:“二十三,祭灶神;二十四,写大字……二十九,贴倒酉;三十夜,守一宿。”是在腊月二十三祭灶之后,准备春联,等到除夕前一日张贴。清乾隆《静宁州志》记载是“岁除日……易桃符,贴门神,设奠祖先”,清光绪《洮州厅志》记载是“十二月二十七、八日,家家写门联……除日,贴门联。”现实中各地贴春联的习俗虽略有差异,但陇上习俗基本沿袭的是腊月二十三以后开始书写、采购春联,多数地区选择在除夕那天贴挂。当代天水籍学者霍松林曾经回忆,每当到了腊月下旬,写春联是十里八乡最重要的文化活动,他从小就跟着长辈们写春联,曾在诗中回忆小时候“拉母亲新衣,看爷写春联”的情景,长成少年时,“每年腊月底,父亲忙于作春联,我也学着作”,“大约十来岁的时候,邻居们就要我为他们写春联了”。霍家三代人写春联的传承,正是陇上人家诗礼传家的典型代表。

临近年关,无论自己能否动笔,准备好春联都是每个家庭必不可少的“年货清单”。著名学者周汝昌不无感慨地说:“春联是举世罕有伦比的最伟大、最瑰奇的文艺活动。”

从两千多年前古人神荼、郁垒的桃符传说,到近年来中国春联贴在了冬奥会场馆、挂在了万里空间站,而一些AI春联、个性化春联也迎合潮流成为网销顶流,千百年来,春联习俗一直在传承、创新。“新桃换旧符”,换下的是形式,而亘古不换的是精神,是凝聚于春联两行文字之间的一个又一个美好祝福、新春愿景、家国情怀。



兰州孔子文化研究会组织的写春联送祝福活动。 资料图



放烟花(漫画) 黎丽



贴对联(漫画) 黎丽



迎新年(漫画) 黎丽